

馮雪峯在“同路人”論上的接收與形成

——《革命與知識階級》管見——

芦田 肇

馮雪峯的《革命與知識階級》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寫而約其四個月後，即在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無軌列車》雜誌第二期上發表的。

《革命與知識階級》是在革命文學論戰中批判創造社的“小集團主義”（即宗派主義）而擁護魯迅的，它的意義不僅僅是如此，也作為一種“知識份子”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論，含有獨特的思想。做論着重這一方面而認定馮雪峯這篇論文很值得注目的。

馮雪峯的這“同路人”論思想，具體地來講，究竟怎樣接收而形成來的？在敝論里，以他寫《革命與知識階級》的一九二八年為時期上的界線，而考慮到他當時只懂日語，把理論上影響到他的想法的暫假設為當時的日語資料或譯成日語的其他外國文件。另外，更進一步考察其他一些使他会形成自己的“同路人”論的因素——主要由他當時的文學環境而來的。

第一，譯成日文的《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藏原惟人，外村史郎合譯）的內容及思想給馮雪峯的影響。他把它譯成中文，以《新俄的文藝政策》為題，二八年由光華書局出版。它是直接影響到他“同路人”論的形成之一。

第二，在中國，早在一九二五年曾出版《蘇俄的文藝論戰》（任國楨編譯）。該書上已有在蘇聯關於擬定“文藝政策”的論爭的具體主張和各論者之間的區別的介紹。而且同書所收瓦浪斯基（А. К. Воронский）的《認識生活的藝術與今代》這論文，比較詳細地說明圍繞“同路人”論思想性的一些觀點。由此可見，在中國比同時期的日本，存在着容易了解“同路人”論客觀條件，這也對馮雪峯的“同路人”論的形成起了一些作用。

第三，馮雪峯在這時期也翻譯了伏洛夫司基(В. В. Воровский)的《馬克思主義的作家論》(他以《作家論》為題出版，所収的是《巴札洛夫與沙寧》與《戈理基論》兩篇論文)。這也是由日文重譯的。通過這個翻譯，他掌握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方法——普列漢諾夫(Плеханов)的美學批評方法。這與他“同路人”思想的形成是分不開的。

第四，馮雪峯至一九二七年以前已翻譯而出版日本昇曙夢寫的關於十月革命以後的俄國新文學的三部著作(即《新俄文學的曙光期》，《新俄的無產階級文學》，《新俄的演劇運動與跳舞》)。這些書闡明了一些圍繞着“文藝政策”的蘇聯文學情況，在他了解蘇聯的“同路人”論上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第五，另外，作為馮雪峯他自身的文學性的基本條件，要指出三個方面。首先，他對魯迅和其文學有着很深的感情、敬慕。通過魯迅的文學及其為人，可以說，馮雪峯才能够辯清蘇聯的“同路人”論思想性的本質。其次，現存回顧一下，這個時期馮雪峯已把日本石川啄木的《我們的一團與他》翻成中文，也顯示着在理解近代寫實主義文學上，他頗有水平。還有他作為“湖畔詩社”詩人已有一些文學經驗這些方面也是，可以說，在他自己方面上使他可能形成“同路人”論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總得來說，由以上指出的理論上的影響以及其他的因素重疊而起一種綜合性的作用，一九二八年的《革命與知識階級》里的獨特的思想，即馮雪峯的“同路人”論是醞釀而形成來的。